

繁盛

李娟

一百多年前最早决定定居此处的那些农人，一定再无路可走了。他们一路向北，在茫茫沙漠中没日没夜地跋涉。走到高处，突然看到前方陷落大地的绿色河谷，顿时倒下，抚地大哭。

他们随身带着种子，那是漫长的流浪中唯一不曾放弃的事物。他们以羊肠灌水，制成简陋的水平仪勘测地势，开渠垦荒。在第一个春天的灌溉期，他们日夜守在渠边，每当水流不畅，就用铁锹把堵在渠口的鱼群铲开。

那时，鱼还不知河流已经被打开缺口。更不知何为农田。它们肥大、笨拙，无忧无虑。它们争先恐后涌入水渠，然后纷纷搁浅在秧苗初生的土地上。秧苗单薄，天地寂静。阳光下，枯萎的鱼尸银光闪闪，像是这片大地上唯一的繁盛。

冬天，河面冰封。人们凿开冰窟，将长长的红绳垂放水中。虽然无饵无钩，仍很快有鱼咬着绳子被拖出水面。这鱼长有细碎锋利的牙齿。即使已被捉在手，仍紧咬红绳不肯松口。它们愤怒却迷惑。世界改变了。

春天，鱼群逆流产卵。鱼苗蓬勃，河流拐弯的浅水处如堆满珠宝般璀璨闪烁。若在此处取水，一桶水里有半桶都是细碎小鱼。人们大量捞捕小鱼，晾干，喂养牲畜。牲畜吃得浑身鱼腥气。冬天牲畜被宰杀地熟后，肉汤都是腥的。世界改变了。

鱼越来越少，人越来越多。耕地不断扩大，沿河两岸上下蔓延。才开始它们如吸吮乳汁般吸吮河流，到后来如吸吮鲜血般吸吮河流。再后来，河流被截断，强行引往荒野深处。在那里，新开垦的土地一望无垠。无论在种子播下之后，还是农作物丰收之时，这片土地看上去总是空旷而荒凉。而失去水源的下游湖泊迅速萎缩，短短几年便由淡水湖变成咸水湖。从此，再也没有鱼了。

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，我们才来到这里。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逾万亩的新垦土地。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。路也是新的，荒野中两行轮胎印。水果也是新的，水泥坚硬，渠边寸草不生。仿佛一切刚刚开始。只有那条河旧了，老了，远在数公里之外。河床开阔，水流窄浅。鱼儿经周折后又回来了，彼此间一条远离一条，深深隐蔽水底阴影处。

其实这块土地并不适合种植向日葵。它过于贫瘠，向日葵太损地力。但是，与其他寥寥几种能存活此处的作物相比，向日葵的收益最大。如此看来，我们和一百年前第一个来此处开荒定居的人没什么不同。除了掠夺，什么也顾不上了。

我妈已经种了三年葵花。各种天灾，各种意外。三年都没赚到什么钱。但第四年她仍坚持播下种子。

记得第一年，我们全家上阵。九十五岁高龄的外婆也被带到地头。出发头一晚，无星无月，我们连夜处理种子。我妈和我叔叔两人用铁锹不停翻动种子，使之均匀沾染红色的农药。我在旁边帮忙打手电筒。整夜默默无语，整夜紧张又漫长。手电光芒静止不动，笼罩着黑暗中上下翻飞的红色颗粒，它们隔天就要被深埋大地。这种子的红色军团，在地底庄严列队，横平竖直。那时我妈和我叔叔就是点兵的大王，检阅的首长，又如守护神，持锹站在地头。而熬过漫漫长冬的荒野鼠类在地底深处遇到这些红色种子，它们绕其左右，饥饿而畏惧。后来这饥饿与畏惧渗入红色之中。此时此刻，我妈和我叔叔的紧张与忧虑也渗入红色之中。外婆不愿离家，她在屋里咒骂，却无可奈何。她年迈衰弱，已无法离开我们独自生存。她的痛苦与愤怒也渗入这红色。同时渗入的还有我的悲哀与疲惫。我一动不动举着手电。手电光芒在无边黑暗中撑开一道小小缝隙。荒野中远远近近的流浪之物都向这道光芒靠拢。一百年前的农人也来了。哪怕已经死去了一百年，他们仍随身带着种子。他们也渴望这红色。所有消失的鱼也从黑暗中现身，一尾接一尾沉默游入红色之中。我仿佛看到葵花盛放，满目金光中充满了红色，黑暗般坚定不移的红色。

我妈已经种了三年葵花。各种天

我的老师叶嘉莹先生选编了一本《给孩子的古诗词》，我因对蒙学没什么兴趣，加之先生年岁已高，也肯定没有全副的精力来做这件事，所以开始并未重视。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反响极好，出版社很快又推出一个“讲诵版”，并且附有二维码，扫描后可以听到先生自己的吟诵和讲解。这些讲诵有人在微信圈里转，我顺手点开了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的一首，一听之下即为叫绝。先生真的太会讲诗了，即使随便给孩子讲讲，也不失精彩。急忙买回，用了两天时间通读一遍。其实，很多诗并没有像《登幽州台歌》那样讲得很仔细，也许有些诗根本不能讲吧，硬讲并不见得明智。只是，这一读，引起了我对“给孩子”的思考。

“孩子”的年龄段最好先确定一下。宽泛些说，十八岁以下都算孩子，能够读诗总得到六七岁吧。六七岁前的孩子，其实读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据说四岁就能背诵《长恨歌》，但现在记忆的诗词并不多，理解尤其不深入。家长望子心切，往往很早让孩子背诵，我以为决非明智。那么，从六七岁到十八岁，起码有两个阶段，就以小学毕业的十二岁为界，前后的领悟能力实在是截然不同的。假如“给孩子”是给六七岁到十二岁的孩子，这个选择尤其应该慎重。

这个年龄段的孩子，记忆力虽佳，领悟力却未成熟。除了罕见的天才，很少有可能真正领会那些精妙深微的诗词作品。家长们也许想不到，孩子在轻而易举地背诵这些诗句的同时，却可能因此永远丧失对诗句的真正体味。叶先生自己就曾写下她读诗时的真实感受：“但是说来可笑亦复可怜，我竟对以幼时读得极熟的作品，反而麻木无所感受了。因

欣此生意，自尔为佳节’等哲理尚不能体会，而古体诗的音节韵律，似乎也不及近体诗的谐和优美，因此我对家人所教的并不感到满足。”（《迎陵谈诗》，第162页）《唐诗三百首》基本是从沈德潜的《唐诗别裁集》中选出的，沈氏眼界极高，尽管编者孙洙尽了最大的努力选择众口流传的名篇，但对孩子来说，很多还是显得过于沉重了。那些寓意深刻的作品，不仅不能使他们理解，甚至会直接扼杀他们对诗词的兴趣。给孩子的诗词，应该考虑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领悟力，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。然而，自《唐诗三百首》流行以来，如此朴素的道理似乎都被大家遗忘了。大家首先考虑的反倒是，孩子应该知道什么样的名篇。

我想，先生的这个选本在出版后反响极好，也许不经意间唤醒了家长对这个朴素道理的注意。先生那段痛心的经历对她的选择起了很大作用，所以她在《给孩子的古诗词》的序言里明确指出：“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要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。”从具体选目来看，不少算不上名篇的东西都入选了。比如杨万里，选的和李白、杜甫一样多，都是17首。先生特别说明：“像这样的诗没有什么深意可讲，就是将眼前的景物写得生动活泼，适合小孩子读，所以本书选了很多首杨万里的诗。”（《给孩子的古诗词》，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，第196页）先生的这个选择理念的确超越了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只是因为她懂得一个极其朴素的道理：过早把蕴含丰富的诗篇塞给孩子，正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。

过于精妙深微的不便选择，是否就该刻意选些通俗，甚至庸俗的？所以给孩子选择诗词真的不容易。常言说“取法乎上得其中，取法乎中得其下”，倘使孩子从小习惯了低俗的审美情趣，也许又使得他们终生不悟高致。因此，《笠翁对韵》之类的俗书，也不可烂熟。孙洙编选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本有其高远的一面，就是为了避免低俗，而要取代之前的《千家诗》。可惜矫枉过正，陷入失误的另外一端。先生对于这一点，似乎没有明确意识到，但出于她天赋良好的鉴赏力，其选择丝毫不曾低俗。

这个选本也许是当前最佳的“给孩子的古诗词”了，然而，我觉得仍可以再改进。先生的高龄使她疏忽了选本的真正定位：究竟是给孩子一个进入中国诗词的读本，还是给孩子一个了解中国诗词的读本。前者必须小心翼翼，防止任何可能损害孩子兴趣和能力的

晚清旅美国园丁的荣誉

方益昉

过春节，除了吃喝团聚，走亲访友，布置家居免不了一些道具点缀。剪窗花、放鞭炮、置新妆、祭祖宗，风俗各地不同。在南方，喜洋洋地请回一株盆栽金橘，看着玲珑富贵，晶莹剔透的金黄果实，往往会生来年发财的期望。但这寻常的物种，对滞留海外过节的华人，却轻易不可得，于是只好购买几枚硕大的橘子、橙子代替，聊以充数罢了。

别看美国橙子又大、又沉，品相油光锃亮，口感水灵甜美，售价倒是不贵，高档货99美分卖你一个，普通货99美分可给你仨。所以有眼光的商贩，大老远地将美橙运到中国。外观金黄均匀，口感数月不变，还美其名，金山橙，或加州橙，唯独不闻、不见喊它大名Lue Gim Gong（刘橘），即美国果树栽培学会100年前，已经确定的学名。

1870年代，上海外滩码头，先后启程四批官派公费的留美少年。这个半途而废的清朝人才后备计划，始于创新，败于腐朽，个中细节已被史家反复重叙。人所不知的是，12岁的广东台山籍少年刘锦浓（英文Lue Gim Gong，曾译刘金缙，吕锦浓，廖振

光），1872年自费从香港搭船去旧金山，一生旅美做园丁，其创新发明的成果，至今被人滋滋有味地咀嚼。

事实上，参与培育美洲橙子，或种植纳帕葡萄，或酿制加州红酒等工种生计，代表了清末华工，在旅美淘金、修路等机会消失后，继续四处开拓生存空间的现实努力。大陆学界很少论及旅美晚清精英的创新成绩和技术发明，却热衷渲染加州华工血泪史。这样刻板的叙事思路，往往忽视乃至掩盖了数十万旅美华工不惜蜂拥出洋的内在逻辑，立足异国的精彩故事。

1848年，加州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广东台山，当年就有2男1女前往“金山”探路，不久捐回小袋金块、金粉。次年，台山立即动身800男劳力与2名妇女。再过1年，台山周边共计3000男性和5位女性越洋淘金。至1852年，仅台山出洋的民工总数就达27000名。

1850年代，从香港驶往旧金山的最低包餐船票30美元，相当于华工一个月工资。据清末纽约时报统计，沿海城市中，熟练机器技工年收156美元，这类高端人才凤毛麟角。普通工匠年收78美元，熟练女工年收仅26美元。农村中，四口之家年收总共



笔墨贺岁

筆會

不见路人唯见鸡（纸上油画）陈燮君、陈颖



诗歌中包含许多数量词，是李白诗作的一大特色。这些数量词让李白的诗歌在具备鲜明的辨识度的同时，也给翻译带来了困难。

品读著名译家对李白一些著名诗句的英译，可以发现他们采用了直译、意译、直译意译相结合三种方法。

“直译”是指原文中的数量词与翻译后的数量词是相同的，这种不做任何改动的翻译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忠实原文。例如《访戴天山道士不遇》中“无人知所去，愁倚两三松”这两句诗，诗人以倚松再三的动作，寄写访道士“不遇”的惆怅。英国翻译家亚瑟·古柏（Arthur Cooper）特别精于我国古诗的

名家英译李白诗句

林晓

翻译，他将这两句诗译为“No one here knows which way you have gone; Two, now three pines I have lent against!”

而“直译”这种方法，对擅长使用夸张修辞的李白来说，很多时候并不适用。比如李白《秋浦歌（其十五）》里

的著名诗句“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”，——这出乎常情而又入于人心的奇句，令众多读者由衷赞赏。关于这首诗，有评论说：诗人以白发之长喻愁之深之重，“尤为新奇”，“兴中有比，意味更长”（见宋人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）。

翟理斯（Giles）是英国著名汉学家，他的译笔以“优雅、鲜活、生机盎然”著称。翟理斯将这两句诗译为“My whitening hair would make a long rope, Yet could not fathom all my depth of woe”。

该译文不是将“三千丈”直译，而是用“long”来形容，显而易见，原文中的“白发三千丈”是扩大夸张，因此在翻译时不必忠实原文，只需表达“非常长”即可。虽然这与翻译原则“信、达、雅”中的“信”不相符合，却保留了原诗的美感，诗歌的艺术感染力未受减损。

我国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也翻译过这两句诗，许渊冲的译文是：“My whitened hair would make a long cord, As long as I am often bored.”——将翟理斯的译文与许渊冲的译文对照着读，自有一番不同的趣味。

有时候，单纯的直译或者意译不足以很好地体现诗意，需要同时借助两种方法才能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。例如，李白诗歌《早发白帝城》有这样的名句：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。“千里”和“一日”，以空间之远与时间之短作对比，表现出诗人“一日”而行“千里”的痛快。在翻译时，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（Stephen Owen）采取了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，将该句译为“At dawn I took leave of the White Emperor. In the midst of luminous clouds, the thousand miles to Jiang ling. I have returned in a Single day”。

有评论认为，宇文所安“比很多中国人更懂唐诗意境”（《汉学家宇文所安：美国人距离唐朝不比中国人远》，《长江日报》2014年7月8日），他对中国古典诗文常有富于魅力的解读和阐发，由此段译文可见一斑。